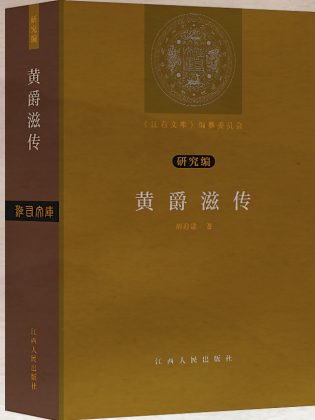




## 植根江右文脉 烛照时代精神

□ 王东林

捧读胡迎建的新著《黄爵滋传》，仿佛进行了一场穿越百年的精神对话。这部传记不仅是一位晚清名臣的生命史诗，更是一幅映现江右士人风骨与家国情怀的壮阔画卷。在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今天，这部著作的出版，恰逢其时。

### 一位被时代召唤的“多维”人物

黄爵滋（1793—1853年），字德成，号树斋，江西宜黄人。在大多数人的历史认知中，他是与林则徐齐名的“禁烟名臣”，是那道震动朝野的《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的执笔人。胡迎建的这部传记，为我们立体地还原了一个更为丰满、多维的黄爵滋。

他是政治家。从泸溪县学训导起步，到翰林院编修，再到监察御史、鸿胪寺卿、刑部侍郎，黄爵滋始终“以直谏负时望，遇事锋芒，无所回避”。他不仅首倡“重治吸食”的禁烟方略，点燃了近代中国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第一把烈火，更在吏治、漕运、河工、海防等诸多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切中时弊的经世之策。他的奏议，“铿鏖而辩，侃侃而论”，充满了“警辟深刻”的洞见与“治国安邦”的担当。

他是文学家与文论家。传记详细梳理了黄爵滋作为“宣南诗社”后期盟主、京师诗坛风雅领袖的文学活动。他的诗学崇尚杜甫、韩愈，力求矫正乾嘉以来的颓靡诗风，主张“体正、气畅、理顺、法明”，写出有真气、有骨力的“志士之诗”。他的古文承继《史记》《汉书》之风，雄健恣肆，说理透彻。钱仲联将其比作“天退星插翅虎雷横”，赞其诗“学杜韩，纵横跌宕，才与学相发”。

他更是教育家与文化传承者。文中“迭遭变故后在南昌”一章尤为动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黄爵滋因户部银库亏空案牵连被革职后，并未消沉，而是应江西巡抚之邀，返赣主讲豫章书院，后又主讲经训书院。在人生低谷，他将满腔经世济民的热忱，转化

为培育后学、昌明江右文脉的实践。在豫章书院的讲堂上，这位历经宦海浮沉、目睹时局艰危的老臣，将其政治抱负、文学理想与人生体悟，倾囊相授于赣鄱学子。这不仅是其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江西书院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将一位庙堂重臣的思考，深深植根于地方文化的土壤之中。

### 一部传记，多重价值

《黄爵滋传》资料翔实，考辨精审，文笔流畅，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更在当下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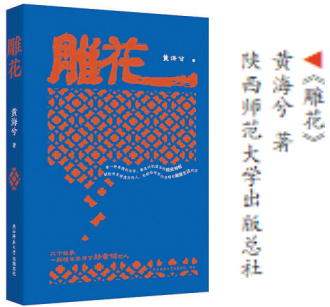
“志士之诗”与“经世之文”的精神标高。黄爵滋的文学创作，绝非文人雅士的闲情偶寄，而是与其政治生命、家国关怀血肉相连的。他批判诗风流弊，探索诗歌源流，其作品“悯时念乱”，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深沉情怀。这种“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传统，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内核。我们今天在推动文艺创作时，黄爵滋的实践提醒我们，真正的精品佳作必须扎根时代、心系人民，具备思想的穿透力和情感的感染力。这恰恰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生动注脚。

“知行合一”与“守正创新”的士大夫风骨。黄爵滋的一生，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实践。他从书院苦读走向科举入仕，从翰林清贵转变为锋芒敢言的谏官，从禁烟斗争的倡导者到海防建设的践行者，最后又回归书院，传道授业。这条人生轨迹，完整诠释了“学而优则仕”“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文化人格。尤其在豫章书院讲学期间，他将朝堂的视野、边疆的见闻、改革的思考融入教学，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将个人的政治实践经验，转化为培育人才、启迪民智的教育资源。这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 雕刻生命的痛感与尊严

□ 王 浩



“雕花”一词，在传统语境中，往往携带着一种精致闲适的审美意味。然而，在黄海兮的小说集《雕花》中，这一动作被还原为一场充满痛感、带着血丝的生存隐喻。阅读本书，如同置身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时代转型期，黄海兮将笔触化作锋利的刻刀，向读者揭示了一种残酷的“减法”生命哲学，雕刻技艺要求匠人剥去木料多余的部分，内部的骨肉方能显露。这种“减法”，正是《雕花》中所有人物共同面临的时代处境。从普通工人到日渐式微的手艺人，他们在宏大历史的叙事中接受着身份、生计乃至社会关系的改变。黄海兮没有留在表面，而是目光向内，探讨普通人如何在艰难的生活中，刻出自己的尊严。

书中的章镇是潮湿、阴冷且充满滞重感的，它不是一处供人寄托乡愁的美好田园，也不是一个完全静止的封闭村落，而是一个被抛入现代化、正在经历剧烈解体与重组的“半熟人社会”。作者将焦点对准了章镇那些逼仄的街巷、昏暗的木工作坊以及泥泞的集市。这个空间里，传统乡镇伦理的瓦解与现代商品逻辑的入侵同时发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撕裂场。在同名主打中篇《雕花》中，章师傅的木工作坊原本是一个象征着传统技艺与师徒伦理的古典空间，但随着时代风气的转变，这个空间被迅速边缘化。作坊里飞扬的木屑与章师傅逐渐加厚的心茧，共同构成了一种视觉冲击力的微观场景。

作者没有去写大时代的波澜壮阔，而是精准捕捉了时代巨轮碾过章镇时，那些细碎而刺耳的摩擦声。这种扎根于粗粝泥土的空间建构，为小说奠定了坚实而凛冽的现实主义基调，也使得人物如野草

般，具有生生不息的韧性。在《大冶》里，毛蛋是章镇青年群像的一个缩影，他削尖了脑袋追求财富和脸面，结果却屡屡被现实的铁壁撞得头破血流。作者没有给毛蛋安排“逆袭”的爽文剧本，打动人的是，毛蛋在满身泥泞中始终没被压垮的那点“心气”。他所有的瞎折腾，不甘心，甚至那些荒唐走板的挣扎，本质上都是一棵野草在向世界宣告“我还活着”。即便被生活踩在脚底，他也要死死抓住泥土，摸索自己的活法，这就是普通人向生活宣告的尊严。

而《大雨淋湿天空》这个篇名本身就带着令人窒息的湿冷感，大雨隐喻着时代洪流与无常命运，它无差别地浇透了章镇的每一个人。作者把人物逼到了一个高度窘迫、逼仄的墙角。在冷雨中湿透的他们，在黑夜中展现出的是普通人之间那种笨拙的，带着防备却又忍不住伸出手的相互试探与取暖。那一点点被激发出来的善意，就像是暴雨中一柄漏风的破伞，挡不住滂沱的命运，却足以给疲惫的灵魂一点点温度。章镇里的普通人从来不是任由命运摆布的静物，生活给他们发了一手烂牌，他们却在泥水里死磕到底。这种在粗粝

现实中强悍生长的生命力，让《雕花》洗脱了单薄的苦难叙事，拥有了一种深沉、扎实而辽阔的悲悯。

黄海兮的文学底色里，始终流淌着诗人的血液。这种跨界的身分，赋予了《雕花》一种极其独特的文本质感，用写诗的克制与凝练来写小说，让语言变成了一把不动声色的刀。在宏大的时代叙事面前，作者没有走向铺陈和呐喊，而是选择了“留白”。他极少在文中直接宣泄情绪，而是将最浓烈的悲悯，压印在那些看似冷硬、琐碎的白描里。这种在沉默的断层处产生的巨大张力，恰恰是诗人小说家最精妙的利器。此外，这种诗性的敏锐还体现在对感官的精妙调动上。在《本香》中，黄海兮以气味为引子，牵扯出章镇里的人情世故、欲望纠葛与生存执念。他用极简的、跳跃的诗性语言，写出了沉重生活与轻盈灵魂之间的拉扯。

《雕花》之所以显得扎实而珍贵，在于作者以一种平视的，甚至贴近地面的视角，扎进了章镇这片粗粝的泥土之中。他不写时代的弄潮儿，也不写彻底溃败的殉道者，他只写那些在生活的夹缝里，依然拼命想要活出一点人样的普通人。这是一份属于无名者的生存证词。作者没有居高临下地悲悯他们，而是用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文字，替他们记录下了每一次在现实铁壁上的撞击。

时代的浪潮总会席卷一切旧有的结构，章镇也许终将变迁，手艺人的作坊也将消失。但只要时代的车轮还在向前，只要普通人还在死磕生活，这场关于生命的“雕花”史，就永远生生不息。《雕花》不仅为章镇立了传，更为这个时代每一个努力活着的人，留下了一道深刻的精神刻痕。



## 书劫记

□ 彭卫平

我不得不忍痛处理一批闲置已久的旧书。此刻它们正静悄悄躺在厨房的储物柜中。在阳光照射不到的角落，它们任由蟑螂与蜘蛛滋扰，它们抱团相守，一声不吭，仿佛被我遗忘。在无数次纠结后，我决定帮它们挪个地方，将它们捆扎，甚至肢解，直至将它们贱卖到附近的废品站。

这场旧书告别仪式几成定局。我蹲下身，凝望着橱柜中这些曾陪伴我多年的“伙计们”，想要对它们临别赠言。但我的语言库是空虚的，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表达我的心境。我仿佛成了一个屠戮者，将它们引向万劫不复之地。

三四个储物柜，满满当当的书籍有些凌乱地排列着。我随意抽出几本，闻了闻，泛黄的书本透出呛鼻的霉味，书页边的污渍与灰尘纵横斑驳，让人目不忍视。扉页上一串串书名《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外国文学大词典》《滕胧诗精选》似曾相识，却又久违。这些书籍曾陪伴过我的大学时光，还与我一起追逐过文学梦想。翻开内页，当年勾画的余痕历历可见，只是笔迹已然漫漶。这些被我“囚禁”于厨房的书籍，大多已逾三十年。大学毕业后，我带着它们离开了校园，再一路辗转于乡村老家及上班的几家单位。一次次打包、捆扎，一路漂泊。

我一向对书籍情愫深厚。书是珍爱，是至宝，是我生命之所托。我的书籍一旦遗失，我会彻夜难眠。妻由此次送我一个“书痴”的绰号，我坦然受之。为了纷纷至沓来的书籍安家，我分而藏之，归类存放。起初，那些大学课本以及后来新买的书籍，依序存放于书房。后来，书愈多，书房开始堆积如山，连床头柜和卧室阳台也被大大小小的书本挤占。妻最后妥协，但我不得不考虑“藏书之道”。再后来，搬新家，我将所有存书悉数运至新房。巧的是，我的新居毗邻大学母校。当这些书籍被卸下车时，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它们在外兜兜转转几十年，居然又回家了。

囿于当年的经济条件，新居未曾装修，我和家人即匆匆入住，这也给藏书带来严重的后遗症。由于书架“满员”，我不得不委屈那些外观陈旧的大学课本，将它们暂时转移到厨房，那里正好有几个空置的储物柜。这一搁放，就是十五年，其间我曾偶尔俯身翻阅，不料触之手感黏糊，且书页间散发出难闻气味。或许厨房的湿气和油烟侵蚀了它们的肌体，加之鼠害与虫害轮番来袭，它们惨遭蹂躏，乃至面目全非。

目睹这些遭我冷遇、受我虐待的旧书，我倍觉自责。我并非没想过善待它们，可添书架的念头迟迟未曾付诸行动。我还多次幻想着空闲时将它们全部读一遍，以此弥补那份愧疚。可我的空闲从玩乐的时光中溜走。不仅如此，我还染上了“喜新厌旧”的毛病，我的目光喜欢停留在一本本装帧精美的新书扉页上，而对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伙伴”熟视无睹。

一场书劫的始作俑者居然是个曾经的“书痴”，这是莫大的讽刺。在出手清理这批旧书前，我想过救赎之法，从中挑选一些尚可阅读的书籍，可几次翻动书页后，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因为担心书籍浓重的霉味引发健康隐患。无奈之下，我只好遵妻所嘱，联系了附近一家废品收购站。也许，那里才是它们最终的归宿。



## 当代年轻人的网络生存图景

□ 沈 鲁

日前，《身份与话语：平台社会语境下的青年文化研究》一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作者席志武作为一个青年学者，曾经沉浸于梁启超的“修齐治平”言论中，而梁启超先生亦是近现代中国最早关怀“青年问题”的先驱者。席志武也因翻译西方“亚文化”研究著作，而进一步产生了对国内“青年亚文化”的观察兴趣，遂进入“饭圈”“弹幕”“网络段子”的平台社会语境中。本书回答了一个核心问题，即在这个无可回避的纷扰的平台社会，当代青年如何不断打破话语边界，主动构建新的身份符号。

作者不是高高在上地评判青年文化现象，而是潜入“豆瓣小组”，混迹“B站弹幕”，观察“微博微信”，像一个田野调查者那样进驻“数字部落”。尽管本书上编大量介绍了关于平台社会与青年文化研究的历史进阶与理论范式，但是由于这种重视个案与细节的“接地气”，使得上编的“综论”与下编的“个论”之间形成了宏观与微观、理性与感性、方法与结论之间的丰富性与针对性。

本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还是下编的若干章节。比如对“萌化”的解读，就没有停留在“可爱即正义”的表面，而是揭示了“萌化”如何成为一种青年文化群体的柔性抵抗策略和身份权力话语。当年轻人用“萌化”解构严肃争论，用“表情包”消解宏大叙事时，这种看似无害的“萌”实际上也在重塑话语权力格局。“萌”成了青年社群的自我保护机制，它既表达了一种态度，又因其“萌化”的姿态而容易获得“中心”与“主流”的包容。又如对“反专家”话语的分析，青年常常不选择正面交锋，而是用“戏仿”“恶搞”“段子化”的方式，主动完成对专业话语的祛魅。这里既有青年文化的独特性，也有值得深思与反思的风险，以及引导的必要性及迫切性。全书所涉网络文本具有日常性、前沿性与新锐性，无论是“新史记”，还是“饭圈”与“互怼”，或是“偶像泛化”都折射出平台社会语境下青年群体对历史书写、社群利益、知识生产、意义输出、权威建构的新态度。他们不拒绝“生产”，但拒绝绝对“生产”的垄断；他们不反对“权威”，但反对“权威”的“压制”与“遮蔽”。一言以蔽之，他们有他们的数字时代的生存智慧。

本书也毫不掩饰地指出“平台”并非中立。平台是深度参与文化生产的“故事大王”。算法推荐、流量逻辑、社区规则，这些看似技术的设定，实际上在悄悄形塑当代青年文化的样貌。平台的流量分配机制，无形中鼓励了冲突性和情绪化表达。平台的圈层区隔功能，既有保护青年亚文化生存空间的一面，也有造成并巩固“信息茧房”的另一面。至于平台与资本的合谋将如何收编青年文化，这个问题更是显而易见。在本书的个案分析中常常可见，当某个亚文化符号出圈后，资本就可以迅速将其转化为某种消费标签。本书的分析与研判，似乎再次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如果是青年在创造一种文化，那么平台与资本就是在定义这种文化的商业价值。

本书的思考是活跃的，分析是敏锐的，结论是慎重的。平台上的青年话语赋予了身份的力量与彷徨，这既是一种数字文化现实，也似乎在作者的观察与思考视域里呈现为一种依恋与批判的矛盾，也许这种矛盾可以简单表述为不同“代际”之间的交往与对话是否还有倾听与理解的可能性？那些在课堂上依旧难以“抬头”而忙于“刷视频”与“刷题”的大学生们，似乎对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不再有多少激情，这是“新身份”的“新人文”？我想本书的作者也有着一份这样的惶惑与不安吧。每一代人，都有着对孤独的抵抗，对连接的渴望，对意义的追寻，所不同者在于立场、方式、态度以及对意义的认识与解读存在差异。

百年前，梁启超先生在印刷媒介刚刚兴旺的那个“平台社会”里发出了“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少年中国说”等平台惊人之语，并以此确立“启蒙者”的身份面对20世纪刚刚到来时同样波澜壮阔的青年文化图景。而本书作者曾对笔者言：“我2025年赴西班牙访学，恰可以比照当年梁任公先生‘欧陆之行’的心迹”。我想这也是一给出主体的观照与传承。本书的价值，或许不在于给出答案，而正在于提出问题，在变化如此迅疾的时代，这或许能引发我们更深的思考。

